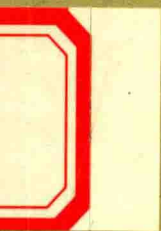


浙江大學
西遷遵義办学「」周年
紀念文集

陈遵平 林茂前 主编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浙江大学
西迁遵义办学「」周年
纪念文集

陈遵平 林茂前 主编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 成 都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浙江大学西迁遵义办学 77 周年纪念文集 / 陈遵平,
林茂前主编.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8.3
ISBN 978-7-5643-6060-3

I. ①浙… II. ①陈… ②林… III. ①浙江大学—校
史—纪念文集 IV. ①G649.285.5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31184 号

Zhejiang Daxue Xiqian Zunyi Banxue
77 Zhounian Jinian Wenji
浙江大学西迁遵义办学
77 周年纪念文集

主编

陈遵平
林茂前

责任编辑 左凌涛
封面设计 原谋书装

印张 14 字数 215千

成品尺寸 170 mm × 230 mm

版次 2018年3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3月第1次

印刷 四川煤田地质制图印刷厂

书号 ISBN 978-7-5643-6060-3

出版发行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网址 <http://www.xnjdcbs.com>

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二环路北一段111号
西南交通大学创新大厦21楼

邮政编码 610031

发行部电话 028-87600564 028-87600533

定价 77.00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8-87600562

序 言



浙江大学西迁至遵义、湄潭办学已经 77 周年了。

1931 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1937 年 7 月 7 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浙江大学全体师生在竺可桢校长率领下，于 1937 年初踏上西迁流亡办学的艰苦历程。经三载奔波，四度迁徙，历尽千难万险，克服重重困难，最终于 1940 年初落脚遵义、湄潭，获得了它在战火硝烟、国破家亡之窘境中相对安定的 7 年教学时间。

在遵义、湄潭办学期间，浙江大学师生以“教育救国，科学兴邦”为己任，箪食弦歌，秉烛夜读；孜孜不倦，潜心学问。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创造了累累科研成果，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科技人才，使浙江大学从一所普通高等学校，迅速崛起为中国著名的高等学府，被誉为“东方剑桥”。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历史虽然已站在新的出发点，浙江大学那段悲壮而又辉煌的西迁流亡办学历史也渐行渐远，但在西迁途中形成并得到认真践行的“求是”精神，不仅为浙大师生垒起一座不朽和永恒的精神家园，同时，也为遵义人民添增了无比丰富的精神财富。

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是大力倡导和身体力行“求是”精神的典范。他在西迁途中的一次讲演中解释说：“人生的目的在于服务，而不是享受。所谓求是，不仅限于埋头读书或是实验室做实验。求是的路径，中庸说得最好，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竺校长还多次强调：“求是精神就是革命精神、科学精神、奋斗精神、牺牲精神和开拓精神。这是科学家应有的言行标准。”除此之外，竺校长在 1941 年发表的《科学之

方法与精神》一文中对近代科学与“求是”精神做过很好的阐述。他说：“近代科学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探求真理。科学方法可以随时随地而改变，这科学的目标，薪求真理，也就是科学的精神，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他认为：“科学家应取的态度应该是：（一）不盲从，不附和，一切以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遇，则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二）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三）专心一致，实是求是，不作无病之呻吟，严谨整饬，毫不苟且。”一而再、再而三地摘录竺校长关于“求是”精神的论述，主要是想强调，如今，重温竺可桢校长的这些箴言，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为了进一步传承西迁文化，弘扬永远的“求是”精神，将那段弥足珍贵的历史记载下来传承后人，2017年5月，遵义历史文化研究会与遵义师范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黔北经济文化研究院共同主办了浙江大学西迁遵义、湄潭办学77周年学术研讨会。

研讨会上，与会者就“求是”精神的内涵，对浙大崛起所起的作用，对教育界的影响，对遵义、湄潭经济社会和科学教育的推动以及“求是”精神的现实意义等内容进行了热烈积极的讨论。收录在本书中的文稿，绝大多数就是为这次研讨会撰写的。

为了让年轻的同志准确了解浙大西迁这段历史、让有兴趣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把握更多的资料，我们征得曾在浙大西迁办学时就读该校的学生幸必达同意，将他参与写作的三篇回忆文稿也一并收录于此。

本书的出版，得到遵义师范学院、遵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的鼎力支持。在此，谨表谢意。

林茂前

2017年8月于遵义

目 录

浙江大学在遵义	毛正棠 幸必达	001
五十八年的沧桑		
——浙大西迁遵义校址考	幸必达	019
六十年后说东归		
——1946年浙大由贵州复员杭州纪事	幸必达	028
“一座名城，两迎长征”	曾祥铤	034
“文军”气象：特殊时空下的浙江大学	谢尊修	037
迁遵浙大学生的抗日民主运动	游平伟	048
竺可桢日记所见浙大迁黔始末	陈遵平	054
浙大西迁遵义、湄潭办学原因初探	林茂前	072
西迁办学：浙大崛起的转折点	林茂前	080
浙大、遵义与“求是”精神	陆昌友	092
求是精神，光耀千秋	王朝裕	097
弘扬浙大西迁精神 促进地方社会发展		
——浙大西迁遵湄办学的困难及发展壮大的启示	裴恒涛	101
浙江大学在遵义（四题）	李连昌	110
西迁办学 往事情深（五题）	林茂前	115
浙大迁遵与仁怀私立崑中	刘一鸣	125

钱宝琮诗作《遵义劳军》	钱永红 129
解读《湄江吟社诗存》	刘 丽 131
谁谓茶苦，其甘如荠	
——《湄江吟社》咏茶诗词赏析	刘 丽 141
不辍吟歌在水湄	
——论浙大西迁遵义期间苏步青的诗词创作	唐燕飞 151
《湄江吟社》茶诗论略	赵 玲 161
竺可桢与傅梦秋	石永言 167
竺可桢教育思想中的人文价值	刘 丽 171
竺可桢游金鼎山	陆昌友 179
失踪千厮门	
——费巩之死	石永言 182
张荫麟	
——一个遵义人不该忘却的名字	陆昌友 186
国学大师钱穆在遵义的岁月	邱 洪 197
以传统精神引领办学活动之探析	王玉桂 205

浙江大学在遵义

毛正棠 幸必达

一、文军长征

遵义地处黔北交通要道，北通重庆，有娄山屏障；南接贵阳市，有乌江天险。名山胜水，雄踞要冲，辖区面积 3 万余平方千米。1949 年前人口 240 万（现有人口 570 万），区内雨量丰沛，冬暖夏凉，有“黔北粮仓”之称，是黔北物资的集散地。遵义又是贵州的文化区，汉代有尹珍、舍人及盛览等三贤，曾师事许慎和司马相如，归来教学乡里，开启本区文教；唐代以后，州县均有书院；明清以来，人才辈出，郑珍、莫友芝、黎庶昌等被尊为“西南三大儒”，海内崇仰。各县学校众多，旧称“文物之邦”。1935 年 1 月，中国工农红军到达这里，召开了后来举世闻名的遵义会议，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历史的伟大转折点，从此遵义成为革命圣地、历史名城。

抗日战争时期，竺可桢校长带领浙江大学四处考察，综合了多方面意见，决定以贵州青岩和遵义湄潭为浙大新的落脚点，也因此得以在相对安静的黔北山区，赢得了七年的时间。

1939 年隆冬，到处雪淞冰凌。浙大师生们一路顶风冒雨，协助学校搬运图书、仪器。在艰难的旅途中，有时连打地铺的地方也没有。竺可桢校长遇到这种艰难的境遇，常常将自己的床铺让给学生，自己悄悄地挤进汽车里过夜。正是校长与学生之间这种亲密团结的关系，才使学校顺利地内迁到黔北。在搬迁中，大部分仪器都未受到损坏。

从 1937 年 9 月至 1940 年 2 月，浙大师生迈着艰难的步伐，经过长途

跋涉，胜利结束了“文军”的长征。一位德籍教员曾在《前进中之浙江大学》一文中写道：

“此行使本校离开一个有名商埠，而回到中国怀抱中”，“回到中国自己的昔日文化中，以求自中国历史和文化里面，获得复兴的必要力量。”

他还写道：

“长征使他们比较成熟了。他们于经行之中，得见乡郊之美，得知乡民困难和问题所自，他们得观感于战事经历中之惨痛，他们且曾置身于艰危之中。由之，遂增长同舟共济的精神，以至曩昔原有的男女同学之间的关系，亦与前异。共同的灾难的经历，使大学变成一个大的家庭。校中经费艰窘，教职员薪俸大打折扣，然皆视为抗战必有的结果。乐于接受，曾无怨怵。”

浙大经过两年半时间的搬迁，没有在战乱之中解体、削弱，而是像滚雪球一样不断扩展。浙大师生经受了磨炼。虽然在物质上遭到各种各样的磨难，但在精神上的收获，却是难以估量的。胜利之种子，已植根于艰苦卓绝的奋斗之中。

从 20 世纪 40 年代初到抗战胜利结束，浙大师生在遵义度过了七年峥嵘岁月。知名教授群集，学子得以良好培育，学校在艰难中得以发展。遵义这块土地，对浙大师生有养育之恩，有休戚与共之情，是学子世世代代不能忘怀的。

二、落脚遵义、湄潭

浙大搬迁至遵义之后，首先是解决校舍问题。初到时校部集中在遵义县城，1940 年 5 月，湄潭分部校舍大致定当；1940 年 12 月，永兴分部也可接纳学生；至 1941 年初，浙大校址基本稳定下来。教学科研活动得以顺利开展。

1. 校舍分布

(1) 遵义县城。

在遵义次东门城墙内外新建数十间草房和瓦屋作为工学院实验室，集中安排化工、电机、机械、土木等各系实验室。并在湘江边开辟游泳池。自湄潭分校建立后，在遵义城内的教学和宿舍用房也做了调整。大体布局是：

新城何家巷3号大院（原清代总兵何行保旧第）、5号周家院（富商周吉善私宅）以及后面的龙王庙，为教务处、训导处和工学院办公室以及大部分教室和男生宿舍。

川主庙：一部分为实验室。

桃源洞旁江公祠：图书馆。

老邮局旧址：部分为男生宿舍。

老城子弹库（原贵州省立第三中学旧址）：校长办公室、总务处、文学院和师范学院办公室及部分实验室。

遵义师范部分校舍：住过部分男生。

杨柳街侯家公馆：女教职员和女生宿舍。

柿花园巷1号原俱乐部：教职员俱乐部。

教授们的住宅大多租用民房，分散在城内各处：诸如碓窝井、杨柳街、石家堡、水碓街、四方台、文庙街、大悲阁、南坛巷、凤朝门、新东门等处。竺可桢校长初居水碓街3号，后移至碓窝井9号。

(2) 湄潭县城。

由于遵义城内房屋不敷应用，浙大又选定距遵义以东75公里的湄潭县城作为学校分部，经过修葺和扩建，成为农学院、理学院和师范学院理组教学活动的地方。大体分布是：

文庙为分部办公室、图书室、部分教室和员工宿舍。

北门外右侧大片土地，新建大礼堂（也是饭厅）和仁斋、义斋、礼斋、智斋四栋男生宿舍，一所子弟小学，还有大操场和游泳池。

西门外过大桥，分左右两侧安排教学用房，向左到牛郎背，辟建浙大农场，占地200余亩，分布着农艺、园艺等系的试验场地。

贺家祠堂：农艺、园艺和蚕桑系的办公室。

禹王宫：农化系。

财神庙：农经系。

另一专用楼房：植物病虫害系。

唐家祠堂：理学院生物系。

西门过桥向右通向双修寺，除旧有房屋外，增建理化实验楼。

梵天宫：化学实验室。

南门外周家祠堂：数学系。

东门原湄潭中学扩建为浙大附中，在其近旁，新建信斋为女生宿舍。

教职工住宅分散湄潭城各处，租用沿街民房与祠堂等。

原在永兴的江西会馆（江馆）和三楚会馆（楚馆）作为浙大办公室、教室和学生宿舍；教职工住宅和实验室又租用多处民房。

2. 学校规模

浙大在抗战初期由杭州西迁时，仅有文理、工、农 3 学院 16 学系。此后，逐年有所扩展。1938 年 8 月，增设师范学院，下设国文、英语、教育、史地、数学、理化等学系。1939 年 8 月，文理学院分立。文学院设中文、外文、教育、史地等系，理学院设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系。同年，设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理科研究所数学部，另设史地教育研究室。工学院的机械、化工两系各开设双班。同年 4 月，设立龙泉分校。5 月，农艺系农化组扩展成农化系。

1940 年 8 月，工学院机械、电机两系设双班，师范学院设二部，另在湄潭设浙大附属中学。1941 年 8 月，设工科研究所化学学部。1942 年 8 月，增设理科研究所生物学部、农科研究所经济学部。1945 年 8 月，增设法学院，设法律系。

截至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浙大共有 6 学院，25 学系、4 研究所 5 学部、1 研究室（史地教育研究室），1 分校（龙泉分校设 8 学系），2 先修班及 1 所附属中学。另有工场 11 所，农场有地 300 余亩。

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外国语文学系、史地学系。

理学院：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药理学系。

工学院：电机工程学系、化学工程学系、土木工程学系、机械工程学

系、航空工程学系。

农学院：农艺学系、园艺学系、农业化学系、植物病虫害学系、蚕桑学系、农经学系。

师范学院：教育学系。

3. 师生数量

在西迁过程中，浙大学生人数也有所增长。1937年10月，有学生633人，随校西迁共460人。至1941年6月，在校大学生1486人、研究生13人、先修班学生40人，附中学生492人。1946年10月，在校大学生2413人。在遵义时期，历年毕业生人数合计为1857人。

教职工人数由于抗战时期经费缩减，增加不多，职员人数还相应有所减少。1941年6月，教师210人，职员165人。1944年，全校教职工人数420人，其中教授、副教授144人，讲师38人，助教110人。至1946年，教授、副教授、讲师共201人，助教108人，职员136人。

三、培植“求是”学风

竺可桢校长原为中央气象研究所所长。1936年4月，毅然出掌浙大，他就任后的第一次谈话就揭示了自己公忠爱国、方正持身、严谨治学与勤劳治事的宗旨：决心发展浙大，为国家培养合乎时代需要而又能为国尽力的专门人才。浙大西迁到宜山时，又正式提出以“求是”为校训。

“实事求是”和“坚持真理”是竺校长一生奋斗的准则，也是他对学生的要求。“求是”原为浙大前身求是书院的院名。竺校长在《科学之方法与精神》一文中，将科学家应取的态度归纳为三个方面，即：不盲从、不附和、只问是非，不计利害；虚怀若谷，不武断、不专横；专心致志、严谨整饬。

遵义七年，竺校长按照这一目标，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贯彻自己的办学主张，取得的教育成果十分可贵。我们管窥蠡测，试从几个方面简要记述，以图以小见大。

1. 罗致人才，增加设备，改善校舍

竺校长说：“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之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教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培育出博学敦行的学者。”因此，竺校长以礼增聘国内外专家学者担任浙大讲席。当时，各院系有张其昀、梅光迪、苏步青、陈建功、贝时璋、谈家桢、李寿恒、王国松、卢守耕、吴耕民、黄翼、郑晓沧等教授。还多方延聘知名教授来校，尽量满足其合理要求。如同意罗宗洛教授来校带四名研究助手，这是没有先例的；对留学归国的江希明等教授先发聘书，寄去路费。此外，还鼓励本校讲师、助教在国内外进修深造，从实践中选拔人才；从研究生中选拔人才留校任职并支持其深造。

浙大还让教授在校务和行政工作方面发挥民主管理的才能。为此规定浙大的最高行政机构为校务会议，由校长、教务长、总务长和训导长、各院长、各系主任为当然成员，另由全体教授选举代表若干人（年选一次）参加。校务会议负责决定学校大政方针，具体工作交下设的各个委员会去办。对不同学派和思想能兼容并蓄，保证研究条件与学术自由。因此，一时有不少知名教授联袂西来，加入浙大的师资队伍，进而植根浙大，领导教学与科研，形成了浙大强大的师资阵容，这是浙大的成就能蜚声国际的重要因素。

竺校长主张浙大应尽可能节约行政经费，使图书仪器费占总支出的 15%~20%，以增强浙大扩充图书仪器的能力。另一方面，竺校长决定酌减学生课堂上课时数，促使学生有时间利用图书馆和实验室进行研究，提高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竺校长又向中英庚款董事会、中华文化教育事业基金会等申请补助专款，通过国外关系增购若干外文新书刊和仪器，使各院系资料设备逐步充实，掌握新的科研和教学方向。当时，浙大物理系藏有整套的国内外的物理期刊，各系的图书仪器都在随时增加。另外积极接受私人捐赠图书。如前校长邵裴子、已故教授张荫麟的夫人，都曾分别赠送图书五千和七千多册；清代藏书家孙诒让的“玉海楼”藏书也部分捐赠给浙大，使浙大藏书由原有的 6 万~7 万册增至 11 万册以上。仪器设备在战

前约值 60 万元，1940 年已增至 200 万元，很多是战时从国外艰难转运购入的，这些图书、仪器对办好浙大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到遵义定居后，除利用旧建筑外，新建在遵义的有工学院实验室群，在湄潭有礼堂（兼饭厅）、理化实验楼、病虫害楼、学生宿舍 5 栋、附中及附小校舍等，都不惜经费，颇有规模。“讲堂、寝室、集会、办公、操练、庖厨之所，都很齐备”“凡屋之数千有余间”“朴而坚，简而不羸”“其新筑取苟完而已”。公用房舍都朴质无华，力求整洁宽敞。一般都省工省费，计日建成，迅速提供使用。在建校工作中，胡刚复、蔡邦华、胡家健等教授协助竺校长经营擘划，奔走联系，卓著勋劳，地方人士对他们都十分熟悉。

竺校长抓大学教育三要素进行建设，为浙大的发展和壮大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2. 重视培养德才兼备的专门人才

竺校长培养专门人才的标准：“不仅求得了解一点专门知识就足够，必须具有理智的头脑；明辨是非而不徇利害的气概；深思远虑不肯盲从的习惯；同时还要有健全的体格，有吃苦耐劳、牺牲自己、努力为公的精神。”他认为，学生只有能够“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将来才能担当大任。他教导学生不但要学习欧美的科学技术，还要有科学头脑，才能促进近代科学文明的产生和发展。对浙大的学生，他要求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体做法是：

1937 年，浙大首先在天目山试行导师制，西迁泰和时普遍推行，到宜山后再拟出具体办法五点，即：①各导师每周到学生食堂就餐一次，留意学生生活并与他们接谈；②全体导师每月开会一次；③每一导师领导学生以 12 人为限；④三、四年级学生以本系教授为导师；⑤导师应随时与学生谈话，解答启导他们。1940 年秋，费巩教授出任训导长，更认真推行导师制，指出导师的任务不是为了监督学生思想，而是积极培养他们成为有人格、有骨气、有抱负、有见识的人，将来可以担当重任，经得起打击，不会被恶势力所同化。在浙大，学生选择导师是自由的。遵义七年，浙大学生在导师制和求是学风的培育下，富有爱国热情和正义感，生活朴实，仪表端庄，治学勤谨，关心抗日救亡和国家大事，为地方人士和青少年学生所敬重。至今遵义人民还怀念不已。

强调培养人才要经过“老师宿儒”的严格训练。学校安排最好的教授担任一年级课程。新生入校先要接受学习目的和人生观的教育，端正入学思想。浙大当时有很多有名教授，符合部聘教授资格的就有 18 人。这些教授，经常在“纪念周”时间为学生做科学报告，用科学家的事迹启发学生爱祖国和爱科学，做正直的科学工作者。许多名教授如苏步青、钱宝琮、王淦昌、朱福忻、束星北、储润科、蔡堡、谭其骧等，都在一年级任过课。他们的学识、人品、治学精神与处世风范，都对学生有深远的影响。

浙大主张文理并重，理、工科学生要打好数理基础，还兼学文史学科，文、法科学生既要重视文史课程也要兼通数理知识，二者不能偏废。主张学生还要不为院系所限，要跨院系选修课程，才能知识广博。竺校长告诫说：“若侧重应用科学，而置纯科学、人文科学于不顾，这是谋食而不谋道的办法。”

各院系高年级都有专门的学术讨论课，由师生轮流主讲，报告新的学术动态或传递新的研究信息，本校新的研究成果也随时做专题介绍。各系都有自己的资料室和实验室，师生养成勤于实验之风，仪器不多时，白天晚上分班做实验。学校的实验室、研究室达 62 个，还有实验工场和农场。学校还尽力保证各种定期和不定期刊物的出版。其中定期的如《浙江大学季刊》等 10 种，《化工通讯》等不定期的 21 种，《校刊》等其他刊物 4 种，为师生提供了发表论著的广阔园地，也交换来不少有价值的书刊。

四、科研成果累累

由于浙大校长尊重人才，学术自由民主，有科研教学设备，有优良学风，加上遵义有相对安定的治学环境，这才吸引了国内外大批学者、各个学派的名教授来到浙大，从事科研与教学工作。当时，中央研究院的科研记录中，浙大的学术论文最多；中央研究院选举院士，浙大有四位教授当选，仅次于北大、清华。

英国科学史家、剑桥生物化学教授、皇家学会会员、英国驻华文化与科学协作代表团团长李约瑟曾于 1944 年两次参观浙大，他在所著《科学的前哨》中记述：

在湄潭，研究工作是很活跃的。生物系正在进行着腔肠动物生殖作用的诱导现象和昆虫的内分泌素等研究。这里关于甲虫类瓢虫所有奇异的色彩因素的遗传方面的工作，在美国已引起很大兴趣。较有名的工作有磺胺类药剂的衍化物的研究（有几种业经证明具有促进植物生长的功效）。在物理方面，因为限于仪器，工作侧重于理论的研究，如原子核物理学、几何光学等，水平显然是很高的。这里还有一个杰出的数学研究所。……具有广大试验场地的农科研究所，也正进行着很多工作，该所发现本地所产的一种野蔷薇的果实（即刺梨）里，含有多种维生素 C，并在枣子里找到维生素 P。该所又在研究贵州著名的茅台酒所用的酒曲。这种酒曲除掉酵母菌之外，还包含特地配入的药材不下 28 种之多。这种配方是一种特异的例证，显示一种办法，根据几世纪经验的工作，竟能在没有消毒设备的乡村情况下，确实有若干良好的结果。这一点甚至有军事上的重要性，因为一部分供盟国军用卡车在中国路面上应用的动力酒精，是从传统方法制成的烧酒送到中央蒸酒厂蒸馏而得的。土壤方面，进行着氢离子浓度的研究和土中微量元素如镍、锌等的研究，特别注重对茶、豆、蔬菜等作物的关系。

李约瑟教授称赞浙大是“东方的剑桥”。浙大的各个院系，包括遵义、湄潭两处的许多研究工作都是处于当时的科学前沿。

文学院对遵义地区的地理和历史进行研究，开展考古和地质野外考察。张其昀主编的《遵义新志》、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播州杨保考》、竺可桢的《二十八宿起源考》、张荫麟的《中国史纲》、刘之远的《遵义锰矿》、任美锷与施雅风的《遵义地形》、缪钺的《诗词散论》、叶良辅的《地理学研究法》以及师生合作对贵州、贵阳、遵义、湄潭的气候、地形、地面发育、地理环境与人生关系等所写的研究论文，都是当时乃至现代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理学院的科研成果如苏步青的微分几何（他是我国古典微分几何浙大大学派的创始人），陈建功的三角级数，钱宝琮的《金元之际数学的传授》、王淦昌的中微子研究如《中子与反质子》和《五维空间场》（与程开甲等合写），束星北的相对论，卢鹤绂与王淦昌的量子力学，何增禄的光学，朱福忻的应力研究，贝时璋的细胞重建研究，罗宗洛的植物生理研究，谈家桢

的遗传学研究，张肇騫的植物分类学，王琨对中国化学史的研究，王葆仁对氨基苯磺胺衍生物的合成的研究，张其楷对有机药物合成的研究等，都是浙大教授们不断探索前进，在科学前沿取得的重大成果，有的还被认定为世界性的重大发现。1942—1945 年，中国物理学会年会曾四次在湄潭召开，宣读论文达 50 余篇，英国李约瑟夫妇也应邀参加 1944 的年会，并将一部分论文带回英国发表。何增禄教授曾做过不完全的统计，浙大物理系教师自 1945 年至 1951 年在国内外杂志发表的论文就有 51 篇。

工学院有王国松的电工学，李寿恒的中国煤研究，钱令希的悬索桥理论和余能定理的应用，钱钟韩的工业自动化研究，苏元复的萃取理论和工艺的改进，侯毓汾的活性染料研究等。

农学院因地制宜，联系当地农业生产，取得了众多成果。如卢守耕的水稻育种和胡麻杂交，孙逢占的芥菜变种研究，吴耕民的甘薯、西瓜、洋葱及蔬果新种在湄潭的试植和推广，湄潭胡桃、李梨之研究，熊同和的植物无性繁殖，林汝瑶的观赏植物，杨守珍的豆薯各部的杀虫作用，彭谦与朱祖祥的土壤酸度试剂，蔡邦华与唐觉的五倍子研究，陈锡臣的小麦研究，过兴先的玉米和棉花，储椒生的榨菜，罗登义的营养学，陈鸿逵与杨新美的白木耳栽培，葛起新的茶树病虫害，祝汝佐的中国桑虫，杨新美的贵州食用蕈人工栽培，蔡邦华的西南各省蝗虫、马铃薯蛀虫、稻苞虫研究，夏振铎的柞蚕寄生蝇，王福山的蚕丝增长，郑衡的柞蚕卵物理性状研究，吴载德的家蚕补叶饲养，吴文晖与赵明强的遵湄农家经济研究等，都是结合生产实际进行研究的。

师范学院文组成果在文学院，理组成果在理学院，独有教育一系自成一家，也有不少成果。如郑晓沧的教育论著与译作，黄翼的物理心理学，陈立的智力测验与人格测验的研究，都是当时的新兴课题，成果在国内外备受重视。

这些成果是在破庙陋室中，没有电灯照明，没有电炉加温，没有温室和冰箱等设备，甚至是在生命并不安全、生活十分艰苦的情况下取得的。物理、化学等系自制云室和感光胶，用人力摇机器，自己动手吹制玻璃用具，用皮老虎鼓风，用酒精蒸气代替煤气，把汽车引擎用于发电，用酒精和木炭代替汽油，甚至要在烈日下工作，利用阳光做实验；生物系和农学